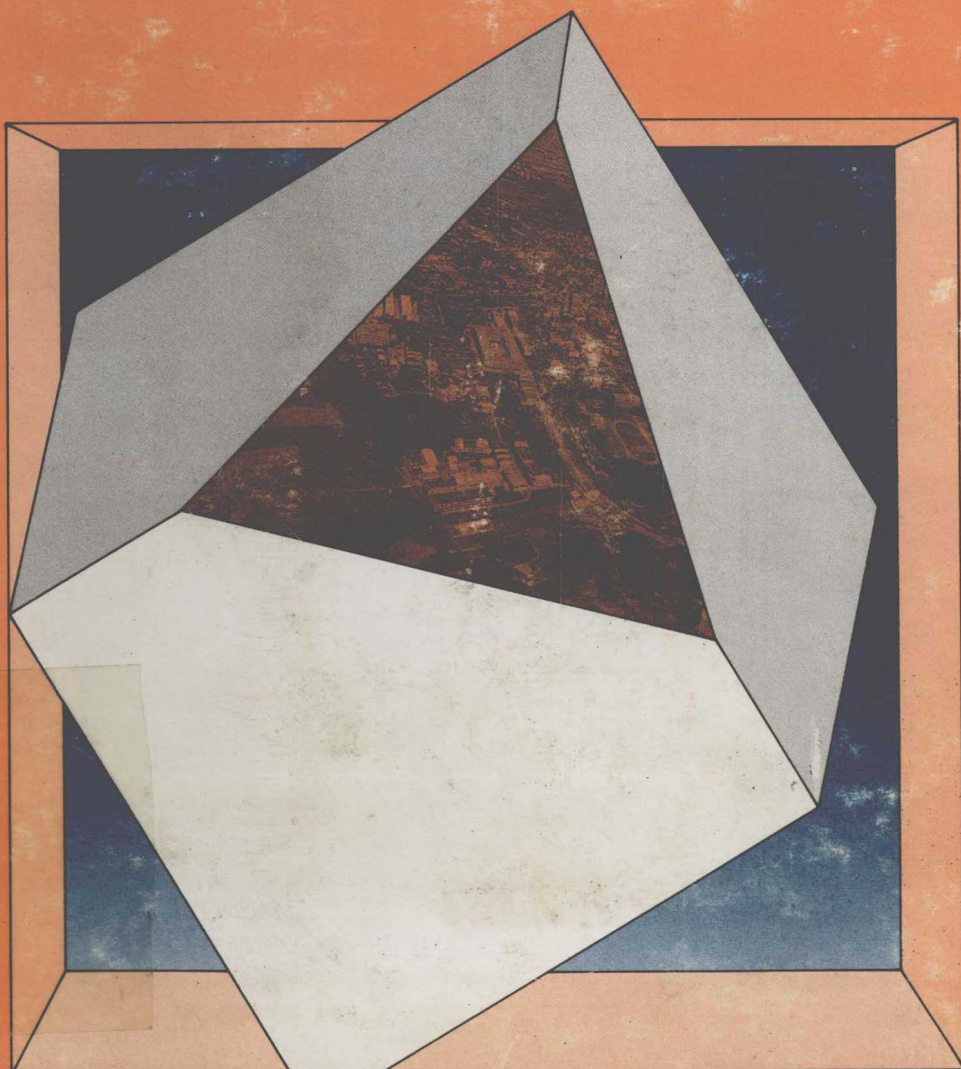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二十號

變遷中的台灣社會

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

楊國樞 瞿海源 主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二十號

變遷中的台灣社會

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

《上冊》

楊國樞 瞿海源主編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刊乙種第二十號

變遷中的台灣社會

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分析

《上冊》

定價：精裝新台幣：肆 佰 元
平裝新台幣：叁佰伍拾元

編 者：楊國樞、瞿海源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印刷者：雷射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555號

電話：7636405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係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支助進行（NSC 73-0301-H001-18），研討會亦由該
會提供補助（NSC 75-0301-H001-28），謹此致謝。

序 言

民國七〇年代起始，台灣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界同心協力，共同推動了一項科際合作的壯舉，那就是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這一調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台灣快速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有系統地蒐集基本的實徵資料，以滿足學術研究與實用分析的雙重需要。以類似的樣本為對象，用相同的問卷為工具，每隔數年從事調查工作一次，假以時日，即可建立異時性的（*diachronic*）序列資料。這樣的寶貴資料，不但可以用來從事有關台灣社會變遷之理論問題的學術研究，而且還可據以進行有關台灣社會現象之具體問題的實用分析。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第一次調查工作，是自民國七十二年開始，歷時三年方得完成。自問卷設計到資料分析，共有三十餘位學者專家參與其事，主要的協同研究人員有李亦園（人類學）、李麗雪（統計學）、林憲（精神醫學）、胡佛（政治學）、袁頌西（政治學）、徐佳士（傳播學）、陳寬政（社會學）、黃光國（心理學）及張春興（教育學），國樞（心理學）與海源（社會學）則忝為計畫主持人。所用問卷的內容，包括基本狀況、家庭組成、教養方式、宗教信仰、人際關係、價值觀念、生活感受、經濟態度、政治行為、教育思想、傳播行為、社會問題、休閒活動及心理衛生等，共二十多大類。所訪問的成人對象遍及全台，每一問卷之有效樣本皆在四千人以上，兩套問卷合共八千多人，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第一次調查研究，是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的倡導與資助下完成，部份實際施訪工作則由主計處統計局的地區調查人員協助完成。整個研究計畫的執行

單位，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為能順利完成全部調查研究工作，所方且曾補助部份經費，支援部份人力。第一次基本調查之能圓滿完成，這些單位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此次為時三年的調查研究，所得實徵資料範圍廣闊、數量龐大。為了提供政府單位與一般人士參考，我們已將基本數據資料逐題製表，並加以簡要說明，編成「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報告（七十四年）」。不過，此項報告中所用的資料僅限於描述性者，其中大部份的基本資料尚可從事學術性的分析。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的範圍內，對於若干學理性問題的探討，這些基本資料具有重要的運用價值。為了擴大此次基本調查工作在學術研究上的成效，特以專題研究計畫的方式，邀請各科學者二十餘位，分別以不同學術專題為重點，深入分析不同部份的調查資料，進而撰成論文。各篇論文完成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執行）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執行），特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贊助下，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台北市南港區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會議室，聯合主辦「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逐篇加以報告與討論。應邀參加此次科際研討會的社會及行為科學學者，共有一百餘位。三天的會議過程中，報告認真，討論熱烈，與會者受益良多。

這次科際研討會的舉行，不但在學術論文方面大有收穫，而且在運用此種基本調查資料以探討學術問題方面，也產生了示範作用。事實上，這次研討會的各篇論文，仍只運用了調查所得的部份資料，尚有大量資料還未用到，有待學者另選專題，從事其他的學術分析與寫作。此項基本調查資料業已全部錄成磁帶，存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歡迎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加以運用。此次基本調查尚屬首創，僅有一個「時點」的資料，自然無法從事真正社會變遷的分析。今後，我們希望能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等等調查工作，以建立兩個以上之「時點」的序列資料，屆時當可從事社會變遷歷程的分析。

這次科際研討會中，一共宣讀與討論了十九篇論文。這些論文在主題上各有所重，在方法上各有所本，但卻皆係認真從事之作品，各有其特定的參考價值。為了便於國內外有關學者加以參考，特將會中宣讀的全部論文重作整理，並分請各位作者親予校訂，然後編輯成冊，出版此書。書中各文雖然皆係運用基本調查之資料撰寫而成，但其主題則相互差異甚大，由此可見基本調查資料所涉範圍之廣闊。希望經由此書的出版，使我們更能體認此種基本調查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

在此書即將付梓的前夕，作為本書的編者，我們應對很多人表示謝意。首先，我們要感謝國科會對這次研討會的鼓勵與資助。同時，也要謝謝國科會主任委員陳履安博士、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及台大校長孫震博士，他們在研討會開幕式中蒞臨致詞，使與會者深受鼓勵。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處長華嚴教授，百忙中仍應邀出席，親自主持討論，其倡導學術之精神，令人敬佩。更要感謝的是撰寫論文的作者，若無他們的合作與努力，這次研討會的績效必然大為遜色。在研討會上，各論文評論者都盡心盡力對論文提出客觀嚴謹的討論。由於各論文作者都參考了評論意見做了修改，編者決定不再刊印評論稿。我們謹在此向各位評論者致敬致謝。他們是：許嘉猷博士、侯崇文博士、伊慶春博士、陳彰儀博士、呂亞力博士、鄭興弟博士、林嘉誠博士、張明正博士、柯永河博士、林邦傑博士、程小危博士、許木柱博士。同時，我們也向評論者致歉，因為他們許多精采的論點沒能在本書中刊出。

在研討會籌劃階段，黃光國教授曾在海源出國期間代為執行籌備工作，奠定會議成功的基礎，我們十分感謝。最後，我們要向民族學研究所劉所長斌雄先生及參與會議籌劃工作的同仁致謝。他們再一度發揮團隊合作及儉樸而有高度效率的精神全力協助研究計畫及研討會的推展。張茂桂教授、何國隆先生、任紹廷先生、陳麗鳳小姐、陳美

鳳小姐等在會議前後出力尤多。在八月底研討會順利召開前，民族學研究所行為研究組研究助理蔡芝芊小姐協助集稿並安排電腦排印事宜，備極辛勞，會後，蔡小姐又協助催收修訂稿，並費時送交印刷廠修改校訂，又負責編製本書索引。蔡芝芊小姐任勞任怨，是參與研討會籌劃及本書編印工作時間最長而最賣力的，我們也特別在此誌謝。

楊國樞 瞿海源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序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目 錄

序 言

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	蔡淑鈴	1
現代化人口轉型與家戶組成：一個社會變遷理論之驗證·····	陳寬政 王德睦	45
主觀生活品質與社會階級·····	張茂桂	61
高度成長下台灣地區人民的經濟態度·····	鄭為元	85
社會問題的事實建構：民眾對社會問題認知的分析 ·····	蕭新煌 張苙雲	133
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	章英華	159
社會變遷中的人際關係及互動·····	謝高橋	195
台灣地區民眾的宗教信仰與宗教態度·····	瞿海源	239
台灣地區居民休閒活動的分析·····	文崇一	277
台灣地區民眾的政治文化：系統結構的權力價值取向 ·····	袁頌西 陳德禹	299
台灣地區民眾對政治參與的態度：系統功能的權力價值取向·····	胡 佛	327
台灣地區民眾的政治評估：從溝通行為與意識形態對公共政策影響的觀察·····	曹俊漢	355
台灣地區民眾接觸政府參與行為的影響因素 ·····	陳義彥 盛杏媛	377
台灣地區民眾的選舉參與行為 ·····	陳明通 胡 佛	401

台灣民眾的心理需求及其相關因素	朱瑞玲 楊國樞	419
義務性道德與功利性道德：台灣社會中的道德判斷及其相 關變項	黃光國	447
台灣民眾的疏離感及其先決因素	楊國樞	473
台灣地區民眾心理障礙與對精神疾病之態度之分析	林 憲 吳英璋	507
台灣地區民眾醫療態度與行為之分析	林 憲 吳英璋	553
附錄	瞿海源 郭文般	595

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

蔡淑鈴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一、前言

台灣是個海島，和中國大陸之間隔著一百八十公里寬的台灣海峽。一直到荷蘭人佔領南部台灣時，才開始有大批漢人來台拓殖。繼荷據時代（1624-1662），台灣歷經明鄭統治時代（1662-1683）、滿清統治時代（1683-1895），及日據時代（1895-1945）後，又重歸中國版圖。台灣歷史的演變大都發源於中國大陸，但是台灣的社會變遷有顯著的特殊性。正如陳紹馨（1979：522）所指出的，「台灣與大陸間的分隔、台灣幅員的狹小、台灣歷史的短暫、台灣所具有的邊疆性格，均使台灣無法形成固定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階層」。職是之故，地位流動在台灣歷史上是很普遍的社會現象，而早期台灣的社會變遷係由統治者推動，是自上而下的被動性變遷（Barclay 1954），其社會階層化現象亦反映出此種特徵。

台灣曾經兩度陷於殖民統治之下。根據陳紹馨（1979：522-523）的分析，「殖民統治對台灣的社會階層化有兩種影響：一方面統治者

*台大農推系研究生王琇麗與李愛美悉心協助資料分析工作，謹此致謝。另外，中研院三民所同事張炎憲與李安妮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建議，作者亦一併感謝。

與被統治者之間有截然劃分的階層分化，但在另一方面，殖民統治有使被治者平等化的作用。……社會中唯一的階層區分是治者與被治者的區分，在被治的台灣同胞之間則無種族、宗教、語言所造成的社會階層區分」。這是早期台灣社會階層化現象的一般特徵。光復以後，台灣由農業社會逐漸轉型為工業社會，「經過幾十年來的工業化過程，不但原有農業社會的組織已經遭到破壞，地主階級蕩然無存，就是原來區分士農工商職業的界線也完全變了。工業社會的階層現象幾乎完全建立在職業的基礎上，而財富、權力、聲望以及與這三者有關的若干指標，如職業的社會地位、收入、教育程度又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文崇一 1985：26）。基於此，分析職業地位的取得與流動過程，以及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成為探討當代台灣社會階層化現象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若依來台時間的先後，台灣的居民可以分為四種族群：山地人、閩南人、客家人，及外省人。從台灣歷史的發展來看，先後來台的四種族群在接觸之初總避免不了武力衝突，譬如墾拓初期的漢番衝突、清代的閩客械鬥、以及光復以後的二二八事件等。如今，這四種族群在教育與職業地位取得方面，是否也彼此競爭呢？實徵探討山地、閩南、客家，及外省人，在出身對成就的影響方面之相似性與差異性，這是本研究之重點。

二、文獻探討

台灣是一個移墾社會，漢人社會的確立與生根，應在鄭成功逐荷復台之後（曹永和 1979：13-17）。在這面積36103平方公里的美麗島上，除了中國文化之外，尚有高山族、荷蘭、西班牙、日本等諸文化的湊會（陳紹馨 1979：5-6）。這些異質文化的先後出現，與台灣的歷史發展密切相關。歷史的發展本是一線相承。社會階層結構的發

展亦如是。以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為例，不僅張炎憲（1985）之史學探討指出，日據時代日本對台灣的經營，奠定了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同時陳紹馨（1979）之社會學分析亦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的社會階層化現象有極大的影響，如本文第一節所述。的確，歷史的發展具連續性，從其脈絡裡去尋找社會階層分化的結構性因素，應該是個可行的研究策略。

根據陳紹馨（1964）的移民社會類型分析，明鄭以後台灣的漢人移民在滿清統治時代，已由散落的原始部落社會（tribal society），進展為內涵著農業文化的俗民社會（folk society）。有關這一段台灣社會發展史的解釋模式，主要有二個：一是由李國祁（1975, 1984, 1987）所提出的「內地化」理論，另一是由陳其南（1975）所主張的「土著化」理論。基本上，「內地化」是指漢人移民社會在政治和社會組織型態上漸與中國本土同化，或在台原住民逐漸漢化的過程。至於「土著化」，則是指漢人移民社會在地緣意識上認同於台灣的過程。陳其南（1984：337-338）認定，「台灣漢人社會之發展過程是『移民社會』轉型為『土著社會』的過程，而劃分這兩個階段的標準是社會群體構成（Social Group Formation）的認同意識，在前期的『移民社會』中，緣於大陸的祖籍意識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而反映在不同祖籍群之間頻繁的分類械鬥事件上。後期的土著化過程則以建立在台灣本地的地緣和血緣意識為新的社會群體認同指標。」

若僅就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而言，台灣之發展與中國本土不盡相同，流露出顯著的特殊性。此特殊性亦充分反映在祖籍群的分化，以及其在社會階層分化過程裡所扮演的角色上。種族或祖籍在台灣曾經是社會團體分化的明顯指標，而即使是現在，台灣的人民仍然「可分為土著山胞和三百多年前由中國大陸來台的漢民族，即中國系統的台灣本省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以後來台的中

國人，即外省人等三種類」(江亮演 1986:85)。其中，台灣本省人又以閩南人與客家人為主。

上述這些不同的種族或祖籍群，來台時間有先後之別。先住民何時來台灣，其經過情形如何，現已不詳。至於先住民自何處移來台灣的問題，則有多種說法。有的說是自南洋方面漂流而來之馬來人種，也有人以為是來自台灣東北琉球群島之琅嶠族，另外有人類學家認為應該是印度尼西亞族(高賢治 1981:12-13)。不論其來自何方，現在通稱台灣之先住民及其後代為高山族。然而，根據李亦園(1982:399)的看法，高山族並非是個合適的名稱，因為事實上有相當大比例的先住民居住於平地，不過尊重約定俗成的原則，一般仍然以高山族的名稱來泛稱台灣土著族群。雖然在九個台灣土著群中，並無共通的语言，彼此不能以各自的語言做不同族群間的溝通(許木柱 1987)，然而從文化上言，他們同屬於南島系，而南島系文化與漢民族的主文化有相當大的差別(李亦園 1982)。

漢人移墾台灣的初期，生存競爭激烈，除了漢民族與平埔族及高山族之間的種族衝突外，漢人之間也常有分類械鬥的現象。當時，社會團體的分化並非以血緣關係為基礎，而是以地緣關係來結合。漢人移民大多來自閩粵二省。閩籍者又以泉州與漳州居多，因此清代台灣民間社會的三大勢力是：漳州人、泉州人、及客家人(或稱粵民)。其中，以泉州人來台時間最早，人數也最多，主要的生計活動為商業、貿易，及農業；漳州人次之，以商業與農業為生；客籍居民來台時間最晚，人數也最少，可說是少數團體，他們主要以農業為生，初時大率為佃民(施添福 1987:1-6)。由於移墾原籍的地域觀念濃厚，不論漳泉或閩粵之間，都曾發生過尖銳火爆的分籍械鬥場面(林衡道 1977:420-425)。分籍械鬥的結果，往往引起各族群的大舉遷徙，使整個台灣在祖籍人群的分佈上更趨於集中。「乾隆末年以降，各籍移民在台

的空間分佈已經趨穩定，而呈現海口和沿海平原多泉，內陸平原多漳，近山平原以及台地、丘陵地則多客籍移民的基本分佈型態」（施添福 1987：179）。清代中葉以後，台灣漢人社會逐漸從祖籍分類意識中解放出來，而以現居的聚落組織為主要之生活單位。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村廟與宗法組織擔任起整合社會秩序的重要任務。這也是台灣漢人社會逐漸由移民社會轉向土著社會的過程之最佳說明（莊英章與陳其南 1982；陳其南 1984）。

日據（1895年）以後才到台灣而民籍不屬台灣的中國人，日本人稱他們為華僑，陳紹馨（1979）則以「外省人」的類屬來通稱他們。其人口數在1900年是五千餘人，到1935年增為五萬餘人，但是隨後卻又減少至1956年之8160人。陳紹馨（1979：452）解釋這種現象是由於：「這些外省人多半是來台灣任職的官吏與軍人，他們退休後沒有回到大陸，而構成台灣同胞之中的少數團體。與閩、粵兩種多數團體混居之後，他們已逐漸同化，而與閩、粵兩種多數團體合而為一。」另一方面，在日本殖民政府以警察與行政組織來維持治安的同時，台灣開始資本主義化的經營。隨著行政組織的日趨嚴密以及工商業的發展與經濟的繁榮，基於地緣意識或血緣意識而結合的同鄉會與宗親會之功能逐漸消失，被整合到有機的行政體系之中。俗民社會隨之崩潰，轉向為資本主義化的工業社會（陳紹馨 1979；張炎憲 1985）。

台灣光復以後，特別自1949年以後，大陸各省人口大量遷台。1956年時，大陸遷台的浪潮趨於平緩，此時大陸同胞的人口數約為九十多萬人，比山地同胞的二十多萬人口多，但是和台灣同胞的八百多萬人口相比，只能算是少數團體（陳紹馨 1979：448）。那時的外省籍與本省籍人士在地理分佈上有明顯的隔離現象。根據章英華（1986）的研究，早期外省人的居住地帶可以分為兩類型。都市內環係日本人移出地帶，由大量移入的外省居民所據。都市外環則聚集於軍眷村。此

外，外省人有過度集中於台北市與高雄市的現象。這是因為外省人隨統治政府來台，大多從事特殊的職業類屬，如軍公教之類，因而侷限了他們的居住地帶。

以上簡短的台灣移民史，可反映出部份的台灣社會發展史。隨著上述之發展，台灣的社會階層結構亦產生相對應的變化。Lenski (1966) 曾以一個世界史觀的階層理論，來詮釋階層體系發展本質上的變遷。他認為社會分配之兩大原則是需要與權力。若就報酬分配而言，權力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細究之，權力決定特權的分配，然後權力與特權再決定聲望的分配。此外，Lenski以科技層次的高低，來說明社會分配系統的變遷。他認為在科技層次較低的原始、簡單社會裡，財物與服務的分配主要以需要為基礎。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分工愈來愈複雜，財物與服務的分配轉為由權力所支配。這是因為科技會直接影響生產層次與經濟剩餘量，同時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人口、政治，以及生產的組織。整體而言，在發展初期時，社會不平等程度會隨著科技層次的提昇而增大。當發展到了成熟的農業生產方式時，社會不平等的程度達到最高峰。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過程，社會流動的機會顯著增加，造成社會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現象。以Lenski的世界性理論模式，來檢視台灣的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特別有趣。但是由於本文之重點，並非在驗證Lenski的理論在台灣的適用性，因此僅選擇性的就以下三方面，分別討論台灣的社會階層現象。

首先，權力決定了台灣社會階層結構的本質與變遷。高賢治 (1981) 依統治政權的轉移，將「台灣三百年史」區分為八個史期：(1)先史時代，(2)顏鄭開拓時代，(3)荷西竊據時代，(4)明鄭統治時代，(5)滿清統治時代，(6)台灣民主國時代，(7)日本殖民地時代，(8)台灣光復以後。在各種不同的統治政權下，台灣的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本質上的差異。比方說，墾拓初期，以武力保護自己不僅是生存上的需要，同時也是

爭取在台立足點的後盾，因此武質社會的色彩強烈，社會領導階層多為豪強之士。鄭氏王朝時代，不僅有封建的王室貴族階層，也開始有土地所有權的分配與制度的建立。到了滿清農業社會時，土地已經是最主要的生產工具了。由於漢人來台先後的不同，在移墾的過程中，造成許多土地爭奪和侵佔的紛爭，而形成台灣土地制度的複雜性，出現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的情況。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也就呈現許多複雜的面相。此外，在文治的教化下，士紳階級逐漸興起，成為社會的領導階層（林再復 1984：300）。其中有一群台灣士紳，如邱逢甲、唐景崧、及劉永福等，在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之時，創議民主，並奮戰六個月，為台灣民主國寫下一頁短暫的歷史（高賢治 1981：196-202）。繼之而來的日本殖民統治政權，打破了台灣社會原有之若干封建制度的特質。取而代之的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截然劃分的高低差序，於是階級的衝突與民族的對立綜錯交合（矢內原忠雄 1956）。台灣光復後，社會多元化的發展結果，促使社會階層化現象亦趨向於多面向的分化（蔡淑鈴、廖正宏、黃大洲 1986）。

其次，回顧台灣史，統治政權之轉移大多與戰爭有關。到了後期時，戰場甚至不在台灣本島上。但是，外在的戰爭卻一樣可以決定台灣政權的歸屬。戰爭所帶來的後果之一是，台灣曾經兩度淪為異族之殖民地。在外來政權的武力征服與統治下，台灣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化，長久以來有一特殊的現象，那就是政治面向與其他階層面向（如經濟與社會面向）的分離。這種政治權力分配特別欠缺「土著化」特徵的現象，是日據時代以及光復以後，台灣土地改革之所以能順利完成的主因。另一方面，種族與祖籍之分化亦常引起本島內的武力衝突事件。在各個不同的時期，衝突的類型與本質不盡相同。在台灣史上，較重要的記載有：墾拓初期的漢番衝突、清代的民變與分籍械鬥、日據時代之抗日民族運動，及光復以後的二二八事件等。

最後，台灣光復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在這段期間裡，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由殖民社會轉變為現代的工業社會，社會階層結構產生了前所未見的蛻變。除了政治面向仍然與其他階層面向分離，延續了雙元階層系統的傳統外，台灣社會階層分化之轉型顯露出世界普同化（*universalism*）的傾向。詳言之，工業社會之階層制度大多建基在職業地位的階層結構上（*Blau and Duncan 1967; Treiman 1977*）。無論是聲望階層的體系、經濟階級的體系、或者政治權力與權威的體系，其根基莫不深植在職業地位結構裡。於是，職業地位可說是社會地位的核心面向。在有關地位取得的研究中（如*Blau and Duncan 1967; Sewell, Haller, and Portes 1969; Sewell, Haller, and Ohlendorf 1970; Sewell and Hauser 1975; Hauser, Tsai, and Sewell 1983*），教育除了本身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人力資本財（或文化資本財）外，尚被視為是個人取得職業地位最重要的機制。換句話說，不僅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昇個人的社會地位，同時不論出身背景如何，憑藉著自己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個人都可以在職業階層的結構裡爭取一席之地（以第一個職業地位的取得為例），並且力爭上游（以代內的職業地位流動為例）（*蔡淑鈴 1986: 304-306*）。瞿海源（1983b）認為這種現象，表示了現代社會重視普同化價值的特徵，同時也顯示出教育價值的普同性。台灣亦不例外。*Wang (1980)*在她的泛文化比較研究裡指出，教育成就對職業地位的直接影響力，台灣約為.363（標準化係數），此數據比海地、哥斯達黎加等國之相對應值高，但低於英國或美國的數據。

然而，歷經最近四十多年來在台灣的發展後，教育與職業的階層化現象是否具有「土著化」的特徵呢？更具體的問題是，來台先後所形成的族群分化，如高山族與漢民族之分，閩南人與客家人之分，以及本省籍與外省籍之分，在職業地位取得過程方面是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呢？這是本文實徵探討之重點。在進行資料分析之前，下一節將